

漫读周末

人世间

一周热评

养老三方协议不妨推而广之

山东烟台县的农村里,70岁以上老人,每年两次,可以到村邻里中心,领取一些政府发放的米面粮油,还会领取孩子们的养老钱。之所以有这一现象,是因为2022年以来,烟台县委、县政府陆续组织全县各个村级组织与老人、子女签订《赡养老人三方协议》,形成子女赡养老人的长效机制。签订协议后,子女须定期将赡养费交给村委,村委再将费用转交给老人。

有了这样的三方协议,如果子女不付赡养费,村委会就可代为追偿,达到违法程度的,还可以请司法机关介入。这就形成了一种震慑,减少了不孝的现象。所以,总体来说,这种三方契约是一件好事,被山东省民政厅确定为2022年度全省养老服务领域创新典型,可谓实至名归,值得推广。

如果从更大层面来看,某种程度上,这是一种定向养老金。这种养老金制度,避免了搭便车现象,多育多得,把生育的外部性回馈给生育家庭,公平合理,也是一个能促进生育的好办法。

“拍黄瓜”或可走出被罚命运

市场监管总局12日公布了新修订的《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,《办法》将从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。《办法》的亮点之一是,对拍黄瓜、泡茶等简单食品制售行为,作出了“简化许可”的规定。

这一修订降低了办理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证的门槛,对小餐饮经营者来说无疑是一大喜讯。过去,餐馆经营者不是不想办该许可证,但由于办理冷食类许可要求较高,如制作凉菜要有专间、专人、专门用具、专门消毒、专门冷柜……很多小餐馆不具备条件,没办法办证。

但“适当简化”这一新表述,如何理解和执行,对餐馆经营者和基层监管部门都是一种考验。“适当简化”究竟从哪些方面入手,简化的“度”如何把握,恐怕地方部门很难科学裁量。这需要出台配套政策给出具体简化标准和指导意见。

整理/大汗



请扫码加群
有本版新闻线索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一本花名册牵出一段共和国绝密往事

老兵回忆:原广州军区组建80人防化连
深入荒漠执行核试验任务

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实习生 周杰 张思宁

6月16日,羊城晚报刊发报道《重返马兰》,记录粤籍马兰老兵时隔多年,重返位于新疆的中国核试验基地,追忆当年为国家国防事业献青春洒热血的奋斗往事。报道刊出后,社会反响热烈,不少当初参与过国家核武器研制及试验、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的老兵们借此联系上羊城晚报,张春雷便是其中一员。

张春雷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、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,曾在部队服役近18年,对于军旅生活,有许多人难忘,有许多事可讲。其中,有一本比巴掌还小的花名册,张春雷珍之重之地收藏了近40年。这本花名册讲述了一段历史:1975年年底,广州军区抽调80名干部战士组成一个防化连,往西奔赴新疆,秘密参加了一次核试验的效应工作。

“这80人里,最高龄的老兵到如今已有93岁,最小的也有70岁了,这么多年过去了,不知道他们现在何处,如今是否安好。”张春雷提及,48年中,这80名老兵四散在各地,少有联络,也很少提及此事,但随着年岁渐长,也想记录下这段历史,他说:“在这件举国之力伟大事业中,广州军区未曾缺席,期盼有关部门能多做一点抢救性记录,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。”

壹
花名册成为重要历史记录

1990年,39岁的张春雷转业到广东省第二轻工业厅,之后被分配到广东省工艺美术总公司,机缘巧合下从事工艺美术行业,在端砚和艺术印章雕刻方面造诣不浅,如今他已是首届中国石砚艺术大师、第三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、高级工艺美术师,有40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收购收藏。

多年来,外界与张春雷有关的报道,几乎都是围绕艺术展开,鲜少有人知晓,在这位大师身上,还有过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。据张春雷回忆,1975年年底,根据总参通知要求,原广州军区抽调80人,临时组建一个防化连参与核试验工作,接到任务时,是他当兵的第三年。

“我被抽调过去后,兼任文书和通信员工作,按照职责就整理了一个花名册,把这80人的名字、出生年月、籍贯、所属单位等资料都详细记录下来。”张春雷说道,“一般情况下不会记录得这么细的,也记不得当时是什么心情,驱使我这么做了。”核试验事业在未解密之前,曾是国家重大绝密事件,这80名被临时抽调的防化兵的个人档案中均没有记载

此事,张春雷的这本花名册极有可能就是此事唯一的历史见证,他有意无意间的一个举动,成为历史记录的重要一环。

在近40年的时间里,张春雷一直珍藏着这本花名册,直到2014年,将其珍重交给原广州军区有关部门,以作历史留存。通过复印件可以看到,这本花名册不过巴掌大小,首页记录着核试验的核爆零时:1976年1月23日下午3时。这一刻过后,80名防化官兵心系国防伟业,冒着生命危险,深入核辐射污染区,进行勘测收集数据等核试验效应工作。

为顺利完成这一光荣任务,这80名干部战士先在广州集中培训,进行强化训练并筹备各项物资,直到1975年12月上旬,才乘车西去新疆。

“我们坐的是闷罐车,车上就铺一点稻草,就这样睡在上面,整整睡了十多天,才在吐鲁番站半夜下车。”张春雷提到,下车后他们又乘车前往马兰核试验基地,一路上灰尘滚滚,到马兰时都成了泥人,在马兰住了一夜,第二天又马不停蹄向在罗布泊腹地的核试验场区开去,更为艰苦的环境等待着他们。

贰
每人每天只有三杯水

被称为生命禁区的罗布泊,荒芜足以吞噬所有,茫茫沙漠中的核试验场区也并不显得突兀,为我国核事业,成千上万人曾在这里奉献青春,甚至失去生命,艰难可见一斑。

吃的是罐头冻肉,少有蔬菜;住的是“地窝子”,一半是往土里挖出的两米深坑,另一半是用茅草搭的简易棚子;喝的水要从百公里外运过来,尤为珍贵,每人每天只有三杯水,早上洗完脸的水舍不得倒掉,晚上用来洗脸,更别说洗澡了。

在罗布泊的这段日子里,恰是严寒隆冬,这对长期生活在温暖湿润南方的80名官兵来说,考验不小。“冷到什么程度呢?广州人吃饭的时候喜欢先洗碗,我们拿着碗过一下水,手就黏在碗上了,然后我们排队吃饭,直到吃完饭,暖和一点了手才能拉开。”张春雷印象特别深刻。

80名防化战士一边克服着生理上的不适,一边迅速开展实地实战训练,从第一颗核爆点开始,逐次对十多个核爆点逐点逐段展开侦

大山里的性教育课堂

在性教育普遍缺失的山区,支教老师肩负起孩子们人生中的关键一课



支教老师给山里的孩子上性教育课

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

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小学里,一场由支教老师带来的课堂正在开展。不同于常见的语数英课程,这门课讲授了男女身体构造、生殖器官,甚至还有性行为是如何发生的。

这是杭州“六个大包”公益服务中心含羞草性教育项目的课堂。在课堂上,支教老师为孩子们讲授青春期身体变化,教导他们保护自己,互相尊重身体边界。在性教育普遍缺失的乡村地区,这些知识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重要启蒙。

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

的成长过程中,女孩选择性地遗忘了这段经历。直到她成年后想要谈恋爱,却发现她无法接受与异性有亲密接触,哪怕是拉手都不行。“她可能淡忘了那段经历,但是身体却记住了那些伤害。”

在高校工作的经历,让凌玮产生了投身性教育的想法,她想让孩子们从小产生自我保护的意识。从高校离职后,凌玮在机缘巧合下,加入了“六个大包”公益服务中心。彼时性教育还没成为“六个大包”的公益项目之一,直到“六个大包”资助的一个农村女孩的辍学,让工作人员们意识到性教育在青少年群体,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严重缺失的紧迫性。

那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女孩,读书刻苦,每年都能抱回

一大摞奖状,但在助学途中,她却主动辍学回家。在回访中,工作人员特地去拜访了这个女孩,才发现辍学的真正原因——她遭遇了性侵。“我回不去了。”面对继续回去上学的劝告,女孩的回答简单且无奈。

此后,“六个大包”公益服务中心开始着手规划性教育项目,并取名为含羞草。为什么会叫含羞草?“含羞草在孩子们的认知里,是一种懂得自我保护的植物,当感觉到危险和伤害来临的时候,它就会把叶片收缩起来,保护自己。”凌玮说。

李春元是含羞草性教育项目的支教老师,对他来说,关注到性教育领域另有原因。李春元曾在湖南怀化支教,一个人负责十个孩子的语数英课程。当时孩子们都

测,记录提取数据,这样的实训,有40多天。通过踩点训练,对熟悉沙漠地形方位,为真实核爆情况下进行实战侦测打下良好基础。

防化连的连长唐昌荣,明年就满80岁了,经年过去,罗布泊的苍茫还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里。“当年我领着队伍要进行预演,但一眼望过去,全是沙,没有参照物,会失去方向感,而且在那个地方,指南针也失灵。”唐昌荣说道,“我们只能一次次出去找路,后来想了一个办法,车上准备一些竹片子,每隔大概50米远就插一个做标记,就这样一个一个插起来,形成勘察路线。”

每个防化兵都清楚知道核弹的破坏性,也知道核爆过后,进入核辐射污染区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前进,每次实训后,严寒中却总是生出一身汗。在危险与艰苦中,80名官兵没有一个退缩,多年的专业知识和实训积累,使他们有相同的底气,此外还都有相同的共识:防化兵就是这个,这是使命。

在紧张训练中,1976年的核试验核爆零时逼近。

『娘娘腔要不要治?』

对于满腔热血地加入含着草项目的支教老师们来说,哪怕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再开放包容,也会经历一场理念的更新。

方蕾是去年加入含着草项目的一名支教老师。在面试时,她被问到“你觉得娘娘腔要不要治?”她愣了一下,心里只是觉得娘娘腔是一个现象,这么说别人好像不太好。她也不明白该如何界定娘娘腔,所以只能向面试官坦白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

但在培训时,她才意识到“娘娘腔”其实是刻板印象的一部分。“大家觉得男性都应该说话很阳刚,所以当少部分男性不符合这个标准时,我们就会觉得他‘娘娘腔’。但其实这是在用部分人的特征来规范所有人言行。”方蕾很受震撼,“这就意味着,不是说娘娘腔很难界定,而是我根本就不该去界定它。”

在试讲环节,方蕾也经历了一场“脱敏”。面试官向她展示了一场性教育授课,课件中包含了许多与性有关的词汇,她按要求在两天内,把这堂课练习试讲。尽管已经步入社会多年,方蕾在听到这些词时仍感到心跳

『尊重对方的边界』

在教学过程中,支教老师们发现性教育并不只是防侵害这么简单。“它更多的是一种人格教育,教导孩子们互相尊重。”凌玮说。

因此,老师们每去一个学校上课都会玩这样一组游戏:他们邀请两名同学站上讲台,请他们依次互相触碰对方的头、肩膀、腰部等部位,在碰之前必须问对方“我可以碰你吗?”如果对方不同意,就要回答“好的,我尊重你。”

在游戏中,孩子们逐渐意识到异性之间存在身体边界:当男生想触碰女生的肩膀和腰部时,有的女生表示同意,有的女生表示拒绝。“通过这样的观察,孩子们就能理解,人和人之间的感受不一样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

剧烈。为了“脱敏”,方蕾练习了五六次,还让自己的女儿在一旁听,确保自己的讲解“不会显得色情”。

支教老师们经历了培训,为的是把性教育知识大大方方地呈现给山区的学生。凌玮发现,相比城市里的孩子,山区里的孩子由于父母不在身边,接触到的性知识更复杂且疏于引导。当支教老师们给他们上性教育课时,他们会称老师为“流氓老师”“黄老师”,“他们对性教育知识有着羞耻感,为了遮掩这种羞耻感,他们会故意表现得戏谑、不屑一顾。”凌玮说。

然而,随着课堂深入,孩子们逐渐感受到支教老师们认真的态度,自己的态度也随之严肃起来。凌玮发现,当老师们讲解完女生的月经现象后,班里的男生看到女生的卫生巾不会再开玩笑。

在课堂上讲授性知识,更重要的目的是帮助学生“脱敏”,洗去性羞耻感。“当我们在课堂上面不改色地谈这件事,学生们也意识到这件事没什么敏感的。那么万一当侵害事件发生时,他们就能够及时求助。”支教老师金梁告诉记者。

边界。意识到自己的边界,就能预防侵害事件的发生。”凌玮告诉记者。

让方蕾感到欣喜的是,当她教导孩子们互相尊重身体边界时,他们的尊重也会延伸到思想边界。在一个五年级班级上完性教育课后,一名女生在课后向自己的同学表达对这堂课的喜爱,但对方不同意她的观点,她沉默了一会,说出一句“好的,我尊重你”。

“这就是我在性教育课堂上经常告诉他们的,大家的观点不同,就好像身体的感觉不一样。无论是对身体还是心理,都要尊重对方的边界。这是我们的性教育最终达成的效果。”凌玮说。



张春雷

叁
冒着生命危险逼近爆心

核爆零时属于机密事件,直到当天,整个防化连队才知道准确时刻。

1976年1月23日下午,这支从广州一路颠簸到新疆的80人连队,小部分藏身靠近爆心的洞中,大部分在距核爆爆心12公里外的沙丘旁整装,队员斗志昂扬,等待着最后任务的进行。

下午3时,准时起爆,火光冲天,一团巨大的蘑菇云翻滚向上,接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,“爆炸后,火光扑面而来,那一瞬间你感觉这个火不是在12公里外,而是就在我眼前。”张春雷回忆道,核爆成功后,沙丘上欢声雷动,但很快被严肃氛围取代,连长唐昌荣大声宣布:“按照原定计划和路线,各战斗小组进场勘察取样。”

在核爆后的第一时间,在最为危险的时刻,防化兵们进场了。

80人团中的一员李经桥也出发了,三人一组,他与队友协作配合执行任务,“这是一种光荣,更是一种责任。”李经桥说,其时他掌握着测量仪器,测试原子弹爆炸后的核辐射程度,“摩托车越往爆心开,辐射程度不断升高,我们就看着那个指针不断往上升,但还是继续往里走,再往里走,直到按照规定完成侦测任务才返回。”他说。而担任连队指导员的江时清,即使知道核弹威力,到达爆心时也不免感到震撼:“有辆坦克离爆心有几十米,有一定的距离了,但核爆过后,坦克的炮塔还能被冲击波震到十几米外。”

原广州军区为此次核试验任务抽调的80名干部战士,由全军区防化部队中营、连、排、参谋等干部和军事训练尖子组成,都是精兵强将,张遂志估摸

着自己队伍里唯一的新兵:“我是1975年当的兵,入伍后,平时训练就是利用观测仪快速观测记录核爆后的各种数据,要求手、眼、口并用,反应迅速,报得越多,测量就越准确。”因为基础扎实、反应快,张遂志也被抽调进队伍里。

作为新兵,有幸参与核试验,张遂志既兴奋又害怕:“我们带着仪器往爆心去的时候,一路上见到预设的大炮被掀翻,泥土石子都被烧成玻璃球,像珠子一样,这些都带有放射性物质,我们心里清楚,但任务必须完成。”

罗布泊荒无人烟,对外界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一台收音机,张遂志最年轻,收音机就交由他背着:“我还记得收音机大概20厘米高,10厘米厚,有长长的天线,在车上也好,吃饭也好,我都背着它。”

整个队伍靠着这台收音机听新闻,直到有天,从广播里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新闻,队伍沉默了,哀痛万分,但又很快继续投入到新一轮作战中去,在时间更迭中,为伟大的事业,接续奋斗。

核爆过后,全队人员在核爆下风方向,按照事先设定的不同距离、不同时间、不同方向,连续几日进行认真的勘察和记录,在将所有勘察数据交给现场指挥部后,这支80人小队踏上返旅程,重回各自岗位,此后长久时间里回忆不提曾参与过这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。

战斗在荒芜的罗布泊,常不知时日。张春雷还记得,返回广州的那一天夜里,在车上突然听到鞭炮声响,外头一片热闹,才恍惚发觉,那天恰是除夕夜,新的一年快到了。